

第一章 起航维艰

(甲午战争之前的留学行动)

中国人走出国门接受今日意义上的留学教育，既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冲突融合的历史必然，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选择，其中强国之梦则是这种留学教育呈现潮流样推进发展的动力。

漫长的农业文明所塑造的华夏民族，在文化心理构成的情结中深深植入了以土为根的生存理念，于是，固守本土、安土重迁不仅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沉潜心底的主体意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公元前 139 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但那更多显现的是政治背景下的外交游说活动；虽然有公元 627 年唐高僧玄奘西行求经，但那更多显现的是单一文化控制下的佛徒朝宗行为；虽然有公元 1405 年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航海贸易和探险，但那更多带有“天朝上邦”滋生出来的“宣教化于海外”的“耀威异域”心理精神……久居“中央之国”地位的华夏民族，是在自我的世界里赏识着自我、审视着自我、发展着自我。现实世界的文化自闭，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心理自闭，而观念意识的滞后就难以产生行为实践的新作为，当现实世界发生重大变异、人类社会走向新的转型时，一个在自闭狭窄圈子里行走的民族，就难以跟上人类文明的行进步伐，只能使自己日渐后进和羸弱。所谓“物极必反”，已经羸弱和落后的中华民族终于在跨入近代门槛之际开始了自我反省和思想蜕变。把自己融于新的世界体系，在异质文化的交互碰撞中寻求新生，就成了其时有识之士们的共识。近代中华欲求复兴并进入新的历史运行轨道，必须从另一样的世界获得发展的动力源！于是，在民族复兴的步伐中，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就成了最见成效亦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从某种角度上讲，近代中华的复兴，因留学而起步，因留学而发展。正是超越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留学教育，中

国人才真正开始接触世界，融入世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也才真正开始实践自己大国崛起的强国梦。因为，留学教育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条能够融合异质文化且快速自我更新发展的进步之路，正是这条通达之途导引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 孤帆远影

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是在一个特别的地域由一个特别的人物开始于一个特别的时间。这个特别的地域，就是现今分划为珠海市、中山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古香山县。香山县所辖的澳门是中国向西方世界开埠的第一个通商口岸，也是向西方社会开启的第一扇窗牖，由此开辟了东西方经济贸易的通道，而其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走廊的入口。这个特别的时间，就是处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1847年，其时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建立的人类社会新的运行轨道之初期，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以工商经济为主导的近代社会转型的关口。这个特别的人物，就是香山县南屏村普通农家出身的容闳——一个后来被国人尊称为“留学之父”的人物。所以，1847年的这个日子我们应该特别铭记，因为这是中国人迈步海外求学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容闳这个人物我们应该特别铭记，因为这是中国远赴太平洋东岸美国耶鲁大学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香山这个地方同样值得人们特别铭记，她不仅送出了后来为国人出国留学开辟太平洋航路的容闳，也送出了踏上大西洋彼岸大不列颠土地成为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的黄宽，她还送出了踏上东洋樱花岛国日本土地成为中国留学日本第一人的唐宝锷。于是，在得风气之先而敢为天下先的香山人的引领感召下，中国人留学海外蔚然成风、壮哉成潮。在先后经历了以幼童留美和海军学生留欧为其主体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以留学日本为其主流又兼有留美留欧行动的清末新政时期留学，以庚款退款留美、勤工俭学留欧和政党选派留苏为其主要走向的民国前期留学，以专才训练为主要特征、以救亡抗日为主要理念的民国后期留学，以政治挂帅师法苏联为其主潮的共和国初期留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起面向世界发达国家以振兴中华为主要理念的新时期留学之后，中国人出国留学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若以20年左右为一代，从第一批幼童赴美迄止今日，则近一个半世纪间七代中国人的留学之旅皆因香山人当年一片孤

帆远渡重洋而开启其历史航路!

(一) “澳”上明“珠”

香山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发源地,是她的特殊地理环境与近代特殊历史时机相际遇,使这个沿海的移民之地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口岸之地、商贸之地、开放之地,这应该说是中国留学现象首现于香山社会的内在根由。

为了说明近代华人留学现象与香山地区的地缘关系,有必要先介绍香山的地理构成和发展演变,分析在这个地理单元中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引发的以葡萄牙为前驱的西方列强渐次侵入而形成近代中国第一通商口岸的历史,剖析在与西方的通商贸易中一种新文化对中华人的渐次影响而导致实践行为改变的过程。为此,我们从移民之地的香山地理渊源及与澳门的关系、口岸之地的葡萄牙人商务活动与西方世界的侵入、商贸之地的经济贸易所带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新构建、开放之地的香山人观察到的外面世界和率先而为的生存自强等方面,来看香山人留学现象的成因。

远古的香山地区,是一个毗邻环绕于南中国海沿岸的浅海沼泽、潮田坑地的地域,瘴气弥漫,适生艰难。秦汉以前,香山地区是处杂树乱草丛生、毒虫蛇蝎出没之地,人间烟火罕见。而后北方中原历朝历代的逃荒者和流徙者不断移民聚集于各海间小岛,使得此地日渐有了人气而走向兴旺。唐时先是在今珠海市香洲区的山场设文顺乡,公元757年又改设香山镇。数百年的延续变迁,日渐聚盛的人口以及形成一定规模气候的盐业和银业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于是在1152年南宋王朝因香山镇建制香山县,所辖今日分属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三地区域。自此,泱泱中华版图上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出现了。其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4000多年的刀耕火种和渔猎种植,到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分。

香山人,一个有着不同的生命经历磨难而相聚起来的移民社会构成体,就这样面朝大海、沐浴海风,开始了与海相伴共生的生存之路。作为行政建制的“香山”概念的出现,固然有它特别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但一个地名概念能否演进成融涵有特定地域而具有特别文化风情的文化性地域概念,主要在于这块地方及其社会日后发展给整个民族或国家带来的影响。划地设县定名“香山”,仅仅是中央政府给一个渐渐发展起来的地



域所实行的行政区划,虽然为这个区域所生存的人们确定了一个名分,但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已。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行政建制概念的确定,使得一方地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口越聚越众,疆域日渐扩宽。于是,香山地域性概念伴随人口的扩增和地疆的扩展而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气。伴随着日益兴盛的人气,这块地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变,生存劳作方式在变,区域人文底蕴亦在变,香山文化的雏形就这样开始了它成型发展的过程。

不过,同华人留学文化更为密切相关的则是在这个地域中更为特殊的地理单元——澳门。作为香山地区海域中的一个孤岛,澳门迟至10世纪之后才出现人间烟火。一个孤悬于南海伶仃洋中开始面积仅为2.8平方公里的小岛群,原本不为世人关注,也难以聚集生民而繁衍生息;但当葡萄牙人的商船队到达其地后,精明的西方商人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发展价值。于是,经过几百年处心积虑千方百计的努力,葡萄牙人终于驻足这个岛屿,并凭借这块地盘繁荣自己的商业贸易,渗透他们的文化因子,其经济文化扩张也把其地的陆地面积由2.8平方公里扩展到今天的28平方公里。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特殊生存气象,必然对与澳门相依相连的香山人构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和现实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自然来自于葡萄牙人源源不断且日渐繁盛的商品交易活动。

从政治的角度看,葡萄牙人借助商贸活动长期占据澳门,无疑是西方列强政治侵略和海外殖民的一种直接行动,但从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活动客观上具有并产生了一种异质文化侵入本土文化本体中造成后者易质的作用。

葡萄牙人实现海上霸权开始于14世纪末。先是非洲航行而发现好望角,再进印度洋而入东南亚,重炮打开马六甲海域后开始了东西方贸易的新历史,其殖民扩张行程的最终目标自然是中国。于是,1513年(明正德八年),葡萄牙人的船队自马六甲前往中国,6月抵达珠江口外毗邻澳门的屯门岛。由于不能获准上岸只许就船贸易,他们销售完货物又满载中国货物于次年返回马六甲。第一单生意的顺利和利润的丰厚,使得他们在离去时偷偷地上岛埋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国徽的柱石,由此足见葡人狡诈的深层用心和日后誓不罢休的引线。

1515年(明正德十年),葡人又进屯门岛,虽然仍然不能上岛贸易,但获得了比上次更丰厚的利润,于次年9月离去。由于前两次对华行动的

成功，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8月，葡人以八艘商船组队的大规模贸易团队第三次进入被他们称为“贸易岛”的屯门岛。这次他们态度蛮横、做派强硬，在未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于1517年9月擅自径抵广州城下，并鸣放礼炮升起国旗。前后8年时间，葡人终究还是没有得到上岸居住进行贸易的权利，而只能在船上进行交易活动。于是，恼羞成怒的殖民者终于在1521年、1522年先后以武力的方式和中国发生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两战之后，葡人离开香山地区沿海转入闽浙沿海走私贸易20多年。这期间又先后爆发了“双屿之战”和“月港之战”，受挫的葡萄牙人由此又折返香山海域，并改变策略、更换方式，不再以武力相挟，行为处事也逐渐文明规范，于是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围绕澳门周边的上川岛、浪白澳建立新的贸易点。

1555年，葡萄牙人费尔南和天主教士巴雷多一同到达澳门，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也被派往澳门并完成他的长篇史诗《葡国魂》。到1557年，葡萄牙商船更是频繁抵泊澳门，并把澳门作为固定停泊地，逐渐运来砖瓦木石，盖屋定居。到1564年，葡人在澳门建立住所达千间以上，长居澳门的葡人也近千人之多。再到1570年，葡人在澳门修建了三座教堂、一间医院、一间仁慈堂，还有大量的西式豪华建筑，澳门从此成了葡萄牙人在华进行商务贸易和停泊船只的居留地。1573年葡人以500两白银作为澳门租金而被明朝地方官员接纳，并定此后延续每年缴纳500两，表明中国官方允准了葡人租住澳门。及至1578年，明政府重新开放广州对外贸易，于是澳门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商贸口岸，西方的商品经过这一口岸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华内地。这种看起来是一种纯商业的贸易活动，其流动过程的物质也只是一件件小小的商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件以及以它们为对象的贸易活动就成了文化、成了政治，受这种活动影响的人们在这种活动中逐渐得到改变，民族社会也在这种活动中不经意地被改变着。由此可以说，是口岸之地的葡萄牙人的商贸活动洞开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进入，商品交易驱动下的利益，使得中国固有的秩序渐次分崩离析，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浸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商品流通开始。

1623年，葡萄牙正式任命马士加路也为澳门首任总督，从此澳门开始了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诸方面由葡人治辖或统治的时代，澳门由此也完全按照葡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及文化理念开始了自身的西化式变迁发展。在葡人治理下越来越规模化的商贸活动，不仅使得澳门自



身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而且随着这些商贸活动的开展和商品自身的流通，一条以澳门为起点的东西方经济贸易走廊得以开通和形成。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原本就属于香山县辖制的澳门越来越脱离香山的肌体，而成为一个另类社会；另一方面它所传输的西方器物 and 显示的西洋风情对当时香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身为香山人的孙中山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到自己 12 岁时在澳门看到的情景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以致有研究者认为澳门是“孙中山最直观萌发学习西方意识之发轫地”^②。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口岸商贸更是日趋兴旺繁盛，使得大量的香山人也介入由葡人统领下的商务贸易活动。这既符合葡人、英人向内地扩充生意经济的需要，也是当地人谋生求利的必然。由此在香山地区就出现了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的“买办现象”，香山也因此被称做“买办之乡”。据统计，从 1830 年到 1900 年的 70 年间，当时活跃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唐山、九江等洋行中的“买办”，香山人十占其八。香山地区的“买办”商务活动，在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同时也养成了第一批和西方人走得最近的中国人，他们个人和家族乃至亲朋好友一层层熏染扩展开来，自然从生活方式到文化心理都开始了渐变。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向香山地区扩展开来。所以香山地区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块流传扩散西方文化的地区，而香山人自然也是最早大面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群。这就鼓动起香山人要了解国门之外的世界的欲望，也就激发了香山人要更深一步认识西方社会的心理，从而在潜意识层面构筑起后来香山人留学海外的思想基础。

香山本身就是由移民而聚集起来的一块地域，移民社会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生存的挣扎力。这种活性挣扎力显现出来的表象，就是不甘于一种活法，总在不断寻找着生活的新路径。漫长的生存实践，在时间的轮回中考验着香山人的生命力，也在时间往复中蓄积和成长着香山人的这种能量。于是，一方面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使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另一方面这个完全西化的社区成了中华第一个通向西方世界的口岸，第一块与西方进行自由商贸的地方，第一方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区域，第一处能全面感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所在……由是更生求新的

① 孙中山：《致翟理斯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第 47 页。

② 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 319 页。

生命意识、敢为人先的生命追求、包容兼收的心胸气度，让香山人能够睁眼看世界，谋求新发展，并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而走出国门，求学异邦。

概而言之，香山人是近代中国最早大面积全方位感受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人群，这是香山地区能够成为中国近代留学发源地和留学者最多的缘由所在。如果说中国人出国留学现象是在各种社会时代潮流涌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香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时代机遇的偶合所构成的近代中华第一口岸之地、商贸之地、开放之地的特殊地缘，则是中国人留学现象形成、发展的首要也是必须的条件。移民之地，使香山人的天性中本能滋生了一种更新自强的精神；口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口；商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体流动的首发之区，开放之地使香山人从异域文化中汲取到了更新自强的力量。由商贸活动深入到文化意识的融汇，新观念下的香山人就有了一种新的行为，这就是了解、认识、学习一个另类的世界，更新、构建、发展一个全新的自我。一句话，香山特定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华夏第一条东西方经济贸易通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走廊，而中国人出国留学正是在这个特定地缘所形成的通道和走廊上开始迈出行进的步伐。

(二) 西学东渐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开始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场新的革命。人文主义思想的倡导，使得欧洲大陆随之引发对科学精神和技术创新的热烈追求，由此相继而来的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300年间，欧洲大陆一步紧赶一步地进入近代文明社会。随之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200年巨变式的扩张发展，西方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新时代。于是，西方文明就以它先进的精神特质开始引领人类世界的发展。

与西方社会相对照，东方世界的中国，虽然15世纪之前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文明，从汉代到明朝前期，是泱泱中华在引领14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然而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长期居于“天朝上邦”文化地位的中华，日渐滋生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封闭式发展理念，故而在近代文明之前，泱泱中华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说长久都是在一个相对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自守的空间里



顽强地自我更新，依然按照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迟缓地移动着她沉重的步履。然而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却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其海滨一隅发生了一个极小局部的改变。

葡人在澳门地面建构起来的社会，自然不只限于经商贸方面的事业和活动，一般近代西方社会应有的成分及内涵，在葡人数百年的统领下也都一一在澳门生发起来。由商贸之地的商务贸易活动带来文化意识形态的新构建，商品中隐含着新的文化，随之新的宗教来了，新的学校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香山人正是在这种中西商贸活动中，开始了精神心理的无意识转移和改变。于是在明清以降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香山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地利优势，屡屡成为这种交流活动的桥梁和起点。就文化交流两大载体而言，“人的活动”由此起步，“物的流动”由此发端，500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汇和融合，几乎无不由该地区“开风气之先”。

近500年中西文化交流，其发端时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古老的中国已进入日渐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因此有别于既往的中外文化交流，自是中华文化不再处于上势地位，交流活动显示出的主流流向是中国转而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子。这种交流活动在明末清初近一个半世纪中，就交流活动的主体而言，应以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活动为是。正是自利玛窦以降的来华传教士们在“学术传教”旗帜下的种种行径，为中华帝国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学术，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中一些积极因子带回西方世界，从而在客观上增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尽管其时传教士在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文化科技知识时是以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作为标准，即只对那些与教义、教规不发生冲突的知识技能加以传播，而凡与教义、教规有所违背的东西则绝口不提，而且这种“学术传教”活动的成果也不能改变活动本身的殖民主义性质，但正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言：“当时耶稣会士们为向中国传入某些欧洲科学的努力是令人赞叹不已的，我们既不能否认传入的大部分知识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又不能否认其重要意义。”^①在这一个半世纪中，通过耶稣会士们的努力，以及包括上至帝王下至士子等诸多中华人物的积极响应，其时的中西

^① [法] 安田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第68页。

文化交流，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使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一些西方器物及其制造技艺传入中国，而且在制度层面上诸如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也为中华人物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上冲击了中国社会“天朝中心主义”文化观念，改变了传统士人抽象的形而上思维方式，以及赋予徐光启、梅文鼎、方以智之流学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一个谁也不会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其历史起点的界标无疑在葡萄牙侵占澳门，从而使澳门很快成为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基地。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中，不仅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几乎都是由珠澳地区登陆然后转赴中国的内地乃至京城，而且那些来到东土难以挪开脚步的天主教徒也几乎无不以澳门作为自己接受中国语言文化及风俗礼仪方面训练的主要基地，甚至当他们受到中华帝国的驱逐被迫返归本土时也被要求必经澳门起程。即使在这时期的高潮过后，由于朝廷规定仅开广州一口通商，大多数时间和场合，澳门为广州的唯一外港，承担着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使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文字载体——书籍和最主要的交流渠道——学校，均由香山的珠澳地区承担其转运或开发的历史使命。其如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大的书籍交往活动，即以珠澳为转运点：一是在1620年，传教士金尼阁就从欧洲募集西书7000部，运到澳门后再分批转往北京，这一西学东渐壮举使中华士大夫获得学习西方文化的原始材料；一是在1650年，传教士在澳门将译出的中国经典著作上千部运回罗马送给教皇，而孔夫子（Confucius）的名字正是通过这次文化活动进入了西方辞典。此外，如传教士白晋自澳门起程回国时，亦随带中国书籍五百多种。所有这些又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是故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及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①再如对中西文化交流作用最大的教育交流渠道，亦以香山的珠澳为其首发之区：早在16世纪后半叶，亦即澳门开埠不久，在“学术传教”理念的支配下，近代欧式教育机构即开始出现。先是1558年，天主教传教士跟随葡萄牙商旅来到澳门，开展教务。由于这些传教士多为饱学之士，在开拓东方传教事业之时肩有对教友施予教化之责，故而他们同时也充当了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据有关研究者考证，澳门最古的三座教堂——约建于1558年的“老楞佐堂”、在1565年即已存在

^① 转引自刘湊冰著《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9页。

的“安多尼堂”以及1576年由教宗下谕立为主教座堂的“望德圣母堂”，“也就是澳门最早开设宗教教育的地方”^①。最初的宗教教育多与中世纪欧洲教育情况相似，不是正规学校教育，而是附属教堂兼授语文和文法的要理班，后来逐渐成为单独设立的宗教教育场所，其中最出名的是耶稣会的公学^②。据有关史料，1571年开办的圣保禄小学是澳门的第一所小学，也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校。由此出发，发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的西式教育在澳门得以形成：

澳门最早的天主教教育，应以耶稣会学塾开始，教学童语文、算术与教理，它也为东来的传教士提供进修，以适应传教需要。到1594年，学塾升格为圣保禄书院（Collégio de St. Paulo），是远东最早的高等学府，它向教士提供语文、文法、哲学、神学、天文、算学等课程。特别是中国语文课程，持续二百多年成为进入大陆传教教士的敲门砖。它为澳门的西式教育写下了辉煌的第一章^③。

这就是说，一方面澳门的宗教教育机构由最初附属教堂的要理识字班渐至单独设置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这种成长过程中的宗教教育机构既教给传教士进入中国社会的知识能力，也兼授来华经商实习的西方人物的孩子以及当地华人孩子。由于这种“洋学堂”不仅免费甚至还向学生家庭提供一些补助以鼓励贫儿入学，故而对邻近社会的穷苦华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后来新教开办的教会学校更是这样。

对于华人来说，有了西式教育的夯基——无论是宗教教育内容还是世俗教育成分，也就有了进入西方社会的能力和资本，于是在来华的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引领下，开始有了远渡重洋的人物以及出洋留学的行动，尽管这种留学所往学校只是西欧各国的教会教育机构，所学内容也主要是一个神职人员必备的宗教知识与传教能力。

据现有史料，中国人最早前往今日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求学，是澳门青年郑玛诺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跟随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前往罗马接受宗教教育，进修神学。郑玛诺在欧洲期间，先后在意大利的圣安德勒

① 刘澍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2页。

② 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55页。

③ 刘澍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1页。

初学院、罗马学院高级部、波伦亚耶稣会神学院以及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攻读。1668年返抵澳门后，他又在澳门学习了一年中文，然后赴广州附近传教^①。在郑玛诺之后，又有沈福宗于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前往欧洲。沈氏先入葡萄牙的里斯本初学院，后于1683—1684年转往荷兰、意大利、法国等地。在法国及后来在英国，他分别受到法王路易十四和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接见，在英国他还应邀在牛津大学做过整理图书之类的工作，直到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才回到中国^②。1702年，又有名为黄嘉略的福建莆田人随法国耶稣会士李斐理前往欧洲，先后到过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等地，后来留在巴黎入读大学，并娶一位法国女子为妻，成了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在欧洲“开洋荤（婚）”的中国人。1707年又有山西人樊守义随同意大利耶稣会士艾若瑟前往欧洲。1708年他在葡萄牙受到葡王的接见，1709年转赴西班牙，旋往意大利并就学于罗马，至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才返回中国。对于自己的欧洲之行，樊守义著有《身见录》一书，此书“实为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③。据有关文字记载，此外还有北京人高类思、杨德望师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学过三年神学，然后于1751年赴法国留学深造15年。再如曾与徐光启一样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过的吴渔山，也曾前往欧洲长期学习神学^④。

除上述数例所举零星赴欧留学研习神学的人物外，探讨在鸦片战争之

① 关于郑玛诺前往欧洲留学，方豪在《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载《史学文存（1936—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中说，是清顺治七年跟随卫匡国前往罗马，在欧洲进修神学17年后返归。而据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中华书局，1995）及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郑玛诺系由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罗与郑父交往密切）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二十日带往罗马。后于1651年入罗马圣安德勒初学院，1653年入罗马学院高级部修读修辞学、哲学、自然神学等历时四年，1657—1660年留该校任教，1660年和1661年先后又往波伦亚耶稣会神学院和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继续攻读神学，不久晋升为司铎。1666年由里斯本起程归国，于1668年8月19日抵达澳门。1673年病逝于北京，时年四十岁。

② 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史学文存（1936—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24～125页；史景迁：《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跨文化对话》第7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171～172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新1版，第855页。

④ 参见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中华书局，2008）有关内容。

前赴欧洲各国求学的中国人，不能不提及与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有关的“中华书院”。1723年（清雍正元年），在中国传教的马国贤因清廷开始对天主教实行禁教政策，不得不返回欧洲。归返之际，经雍正皇帝批准，他带走了谷文耀、殷若望、黄巴桐、吴露爵四名中国学生。1724年马国贤带着这四名青年到达意大利那不勒斯后，即将自己在中国朝廷供奉的积蓄及筹集的其他款项用来兴建中华书院。该神学教育机构主要为天主教向东方扩张培养神职人员，主要招收中国、土耳其、东南亚等东方国家及希腊的宗教青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招收的青年，通常是由澳门天主教的主教负责考查和遴选。这些入选者必须是中国天主教徒的后代，他们赴意大利之前，必须先澳门的一所天主教女修道院学习两三个月，然后再送到中华书院。自1732年（清雍正十年）创立到1868年（清同治七年）停止，这所设在异国的“中华书院”共培养中国学生106人，成为其时欧洲培养中国神学人员的摇篮。另据方豪先生考证，自清顺治年间到同治初年，中国前往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西欧国家学习神学的“留学者”，共计120人左右^①。这些人大多学成归国传教，也有长留不归者在异国他乡作为天主的奴仆。

对于上述诸般中国人的出国“留学”行动和采取出国“留学”行动的中国人，既往研究留学教育史的文字，其评价语调有所低抑。或认为：“虽然早期赴欧的天主教徒在西方也多少学到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常识，但他们主修的是天主教神学。众所周知，17、18世纪是西方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而他们却似乎毫无所感。无论是各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新，还是思想启蒙运动，他们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在这方面，早期赴欧的天主教徒还比不上他们的西方宗师。”^②或认为：“那时所谓的留学还不能称其为运动和具有现代意义，一是因为留学者都是由西方传教士返回欧洲时带去的，人数极其有限，二是这些留学生没有为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③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给予他们的条件以及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再从中西文明的对接和中外文化的交流的角度上来认识这种“留学”行动，这些人物还是有所贡献和值得肯定的。例如，有关学者提到，1751年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347页；《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史学文存（1936—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6～137页。

②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第50页。

③ 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页。

至1766年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天主教徒归国后就撰写过《中国兵法论》和《米谷保护法》的论文,这些文字寄到法国后受到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尔哥的重视^①。又如,1805年春专程前往英国伦敦一所寄宿学校学习英语的广东青年容三德,不仅在归国后对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提供种种事业帮助、释解其精神压力,更重要的是早在伦敦时他就与马礼逊过从甚密,既教授马礼逊中文,又与后者一道前往伦敦博物馆抄录中译部分《圣经》手稿,还从英国皇家学会借抄到一部拉丁文中文字典手稿,为马礼逊来华后编撰著名的《华英辞典》打下基础,从而“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值得注意的一笔”^②。再如,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赴那不勒斯“中华书院”学习神学的湖北潜江人郭栋臣,在留学12年后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归国,后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再度赴欧,任教于罗马传信部传信大学,其间将《三字经》译成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并著有《华学进境》一书在那不勒斯出版,供意大利有志研究中文者学习,成为一位真正的“传授华学于海外之先驱”^③。

综观上文所列清同治朝以前以宗教信徒为其主体、以研求神学为其主旨、以学为教士为其主导的国人赴欧“留学”,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所赴国度在于“天主教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所学内容除接受“天主教的宗教教育”也学习了“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世俗文化、科技方面的知识”,所选路向或留在国外献身宗教事工或学成归国“从事传教与翻译工作”,所取行动基本上在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外且大多是“跟随外国来华传教士”而远渡重洋^④。此外还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种留学人物首途者出自澳门,这种留学行动起程处亦多自澳门。

同治朝之前出自澳门的留学首途者不仅只有赴欧人物,同样也有赴美

① 张芝联:《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

② 吴义雄:《容闳之前中国人留学海外寻踪》,见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第116~117页。又:据米怜《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史》第55~56页记,容三德在伦敦抄录的是巴塞译的《圣经》抄件。

③ 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史学文存(1936—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6页。关于郭栋臣在归国十三年后于1886年再次出国,另一说法是往意大利主持“中华书院”(即出任“学长”),直到该宗教教育机构停办,即将“中华书院”停办时间定在1891年(参见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第7页)。

④ 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124~125页。



人物。据现时可以查及的资料，中国人最早抵达美国这块遥远的土地，最迟也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据美国人贝纳（Burnett）所编《大陆议会之书信》（*Lett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在1785年有五位中国人曾向“大陆议会”提出将他们遣返中国的要求：

他们自述曾被一位刻薄的船长劫持上船，他们搭乘“柏来斯”号（PALLAS）于该年八月在巴尔的摩下锚。这五位华人亲笔签向“大陆议会”的请愿书，至今仍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①。

后来在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美人亚里斯多德从纽约港口开出“海狸”号前往广州时，发现有一位由广州来的中国商人要求搭乘该船回广州。另外，美国渥纳（W. F. Worner）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历史学会”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A Chinese In the Civil War*）的文章，告知世人有一个名为吴恒毅（Hong Neok Woo）的中国人曾在宾州民团中服役^②。吴于1855年3月乘美国兵舰到达宾州费城海军码头，后于1860年9月22日在地方法院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由此数例可知，早在同治朝之前，就有中华人物踏上美国的土地。不仅如此，现有资料还表明，鸦片战争之前还有中国人前往美国进学读书。

1812年，澳门附近乡村一位叫秦三才（Tschin San Chai）的青年，希望“获取英语知识，以便能做一个通事”，而第二次前往美国纽约。但他在开始时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在中国移民群中打工度日，直到1816年得到一位尼奇太太及其儿子约翰·尼奇（John Nitchie）的帮助，才进入一位神学院教授开办的主日学校学习英文。一年后他因进步很快而能将马礼逊译成中文的《圣经》某些章节回译为英文^③。在秦三才进入主日学校后不久，又有一位中国学生于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进入美国康威尔（Corn Wall）的“海外布道学校”（The Foreign

①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注，珠海出版社，2006，第157页。

② 〔美〕William F. Worner：《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台北）《传记文学》1975年第27卷第3期。

③ The Indo - Chinese Gleaner, Vol. 1, Malacca, February, 1818, pp. 78 - 83. 转见吴义雄《容闳之前中国人留学海外寻踪》，见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第117页。

Mission School)。到1818年时,该校中国学生增加到2人。1824年,后来成为林则徐译员的阿林(W. Alun)、阿兰(Henry Martyn Alan)兄弟亦进入该校学习。据有关史料反映,该校“至少有五位中国学生在那里读过书”^①。再到1832年,另一位叫做阿林(Ah Lun)的中国少年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米都城(Middle town)留学,“两年后他陪同美国传教士伯驾到中国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②。

与近代之前留学欧洲各国的中国人相似,此期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也基本上求学于美国的宗教教育机构,只不过这些人留学美国的学习目的,更在于学好外语(英文)以利回国谋生。因此从中外交流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正如美国学者勒法吉所言:“早期的中国人,惜对早期中美文化交流贡献不大。但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是突出的例子。对研究中美文化关系,他们具有重要的地位。”^③正是容闳,这位被称做“留学生之父”的人物,才真正开通了中国人出国留学的航路,而他同样是先在澳门学好走进美国社会的英语,掌握到列宁所说的“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④,同样是从香山迈步走出国门的中国人!

(三) “留学之父”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开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一带,就有人去美国和欧洲学习与游历。但从今日留学教育的含义上讲,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同时也是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是广东香山人容闳。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距离澳门四英里的古香山县南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六口,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全家人生活来源全靠父亲田地耕作所得。幼年时期的容闳没有进过中国人办的学塾,与同时代求学孩童一样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7岁时他被送进澳门教会学校读书。至于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被送到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去念书,而没有像哥哥一样被送到当地的私塾,据容闳自己的猜测,当时

①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注,珠海出版社,2006,第157页;高宗鲁搜集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第136页。

② George B. Stevens ed.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Boston & Chicago, 1896, pp. 94-96. 转见吴义雄《容闳之前中国人留学海外寻踪》,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容闳与科学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第118页。

③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注,珠海出版社,2006,第157~158页。

④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370页。



中西已开始交往，父母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个交往将来一定会日渐扩大，因此必须把握机会，让孩子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去学习英语，将来可以当个“通译”，取得一份较好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

对容闳求学之始进入的这家洋人所办的“学校”，他的侄子容尚谦有过这样的描述：

他进入一所由古兹拉夫夫人 (Mrs. Gutzlaff) 开办的、最初只收女生的学校。这时容闳七岁，是第一批被准许入校的两名男生中的一个。古兹拉夫夫人是哈里·派可斯 (Mr. Harry Parkes) 先生的姑姑，而派可斯先生则是跟随两个姐姐来到中国，帮助她们管理这所学校的。容闳博士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念了一个短时期的书^①。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1838年，古兹拉夫夫人的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容闳只得回家务农。两年后父亲不幸病逝，容闳为生活所迫或提篮小卖，或打草，或拾稻穗，过着一种衣食不足的流浪儿般的生活。

就在容闳从古兹拉夫夫人学校归家不久，澳门出现了另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书院（即马礼逊学堂）。这所教会教育机构是为纪念最早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而设——马礼逊于1834年8月在中国病故。学校的开办者为马礼逊教育会。1839年2月受该组织聘请的美国传教士布朗（亦译作鲍留云），在耶鲁大学的推荐下来到澳门出任该校校长。当年11月4日马礼逊学堂创办开学。1841年容闳进入该校念书，先一年已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五人入学。他们六人可以算是马礼逊学堂的第一班学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堂于1842年迁至香港。直到1846年，容闳始终在这所西式学校读书。

根据马礼逊学堂的一份课程表（见表1-1），可以大略了解容闳在赴美之前所受的教育。

^① 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王敏若译，珠海出版社，2006，第2页。

表 1-1 马礼逊学堂课程安排表

年份	所学课程与教科书				备注
1839— 1840	英语阅读和口语, 布朗所编教材	地理, Parley 编写的教材	算术, Gorden 编写的教材		
1841— 1842	英语阅读, gallaudet's child's book on the soul	地理, guys geography	算术	历史, peter parley method of telling stories of the world	历史课上讲述英国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842— 1843	英语阅读写作, 书写训练	地理	算术, 代数, colbum's intellectual arithmetic, sequel	历史, Keight's history of England, 罗马人入侵到查理一世时期	
1843— 1844	英文阅读写作, 英文书写	地理, 欧洲非洲美洲及部分亚洲地区的自然地理	算术、代数、几何, colbum's sequel	历史教材同上年度, 查理一世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1844 年 5 月开始学习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1844— 1845	英文阅读写作, goodrich's third recorder	地理, 各种地图	算术、代数、几何	力学结束初等课程	本年度开设声乐课程
1845— 1846	英语阅读作文, 以圣经为教材	地理	代数、几何		

资料来源: 马礼逊教育会 1839—1846 年各年度报告, 《中国丛报》6~15 卷。

1846 年, 布朗先生由于古兹拉夫夫人的健康关系, 准备离开中国。出于对这批学生的情感和培养教徒的目的, 他希望能带少数学生跟他赴美, 继续完成教育, 并在课堂上要求愿意跟他去的学生马上起立。按照容闳的回忆, 当时教室鸦雀无声, 容闳是第一个起立的, 次黄胜, 次黄宽。他们赴美的经费, 按照布朗和该校校董的安排, 由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肖德鲁特、美商麦企、苏格兰人康白尔等资助, 以两年为期, 并补助三个人父母两年之赡养费。

容闳的母亲起初自然不愿意, 但经过容闳再三的请求, 最后不得不让

步。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就此离开故土，踏上异国求学之路。1847年正月初四，容闳一行在上海黄浦起航远赴美国，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女猎人”的豪华轮船，经过九十八天的航程，四月十二日抵达纽约。

容闳等三人进入麻省孟松学校求学，孟松学校是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所预备学校，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正规的高级中学，整个新英格兰区的优秀学生都集中在这里为考入大学预备功课。孟松学校的校长自开创以来也一直由“名誉特著”的品学兼优者担任。容闳入学时学校校长为海门德。海氏毕业于耶鲁大学，夙好古典文学，尤嗜英国文学。他思想豁达，富有同情心，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著名教育家和“戒酒与新英格兰精神运动”的倡议者，由于他的威望，孟松学校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兴盛空前。容闳三人受到美国人士的礼遇。海门德对中国素抱好感，希望三位中国学生学成之后能回国有所作为。他把三位中国学生都安排在态度温和的瑞白克·勃朗小姐的英文班里。勃朗小姐对容闳关怀备至，假期里时常请容闳住在她们家里，帮助他学习功课。容闳在孟松学校学习了算术、文学、生理、心理和哲学等课程，成绩最好的课程是英国文学，这主要是受了校长海门德的影响。海门德对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善于演说，上课时感染性极强。经他指点，容闳阅读了爱迪逊、戈德斯密斯、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

因为当初香港方面答允对容闳等的学费资助限定两年，容闳和黄宽（三人中年龄最大的黄胜因病已于1848年秋提前回国）不得不为下一步的求学早做打算：

惟一八四九年后，将恃何人资助予等学费，此问题之困难，殆不啻古所谓“戈登结”，几于无人能解者，则亦惟有商之于海门校长及勃朗君^①耳。幸得二君厚意，允为函询香港资助予等之人。迨得复书，则谓二年后如予二人愿至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学习专门科者，则彼等仍可继续资助云云^②。

收到上述回信，黄宽为了继续得到香港教会的资助，选择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进入爱丁堡大学在那里学习七年后，于1857年回归中

① 即布朗。——引者注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57页。

国。“他毕业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他的医学班上名列第三”，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具有天生的医学禀性，在专业上出类拔萃”。“他的能力和医术的高超，使他享誉远东，被认为是那个时期‘地中海以东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之一’。”1879年他在广州去世，“他以自己的品格、率真和纯正的一生，赢得人们高度的崇敬”^①。对于这位兄弟般的同乡、同学，容闳是这样评说的：“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盛，声誉益隆。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②

至于容闳本人，因为他“甚欲入耶鲁大学”故而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从孟松学校毕业后，除了自食其力外，容闳幸运地获得了布朗的姐姐所在的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1850年他考入耶鲁大学，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涯。据他自己回忆，他的大学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艰辛：“余之入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③ 沉重的经济和学习负担使容闳的学习成绩不尽理想，数学差到几乎不及格的程度。一年级时他时常担心因数学成绩差而被留级。但由于他的英语作文经常在全校比赛中得一等奖，他的平均分数仍在中上水平。

从三年级开始，他的状况略有好转。经济上除了得到一些来自萨伐那妇女协会和纽约奥利芬公司的资助外，他在校内又谋得几个打工机会。高年级学生的一个俱乐部聘请他去做办事员，负责一切采买和伙食供应工作。用这种方式，容闳获得了今后两年的食宿费用，又在学校内的兄弟会图书馆得到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可得薪金30元。他的学习也追赶上来，各门成绩都有提高。所有这些加上他的中国国籍，使容闳在四年级时已经变成全校人人皆知的人物了。1854年夏天，容闳在学完了所有必修课程之后，获得了耶鲁大学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① 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王敏若译，珠海出版社，2006，第3~4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57~58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59~60页。



按照容闳所记,大约在美留学的最后一年,他对于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有了一个计划,这个“应行之事”就是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能够享受到像他本人那样享受的教育成果,这种计划的最后实现即后来敦促清政府选派学子赴美留学: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①。

作为一个支配了容闳一生事业的指导思想,它的形成绝不是某一时刻的突发奇想,而是经过长期观察、思考,建立在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上思想的沉淀结晶。

首先,容闳对祖国的贫穷落后、面临的巨大危机有直观的认识。他在赴美留学之前,对贫困农民家庭的生活有切身而深刻的体会,对家乡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情形有思想最底层的印象,在美国留学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因此自己心内“痛苦亦多”、“快乐益少”^②。如何复兴中国,把中国变成富强康乐的大国,无疑是满怀爱国情感的容闳在美期间时常思考的问题。

其次,容闳从少年时代起,在澳门、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17年,对中西教育的差距,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状况有真切的感受和直接的观察,向西方学习、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自然成为他给落后衰弱的中国开出的治病良方。

必须认识到,容闳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新旧替变的前夜,同时代的洋务派官员、早期改良派士子也逐渐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力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范围和内容逐渐丰富和扩大。与其他人相比,容闳的优势在于他是第一个出洋留学之人,故而他能够提出很多较同时代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更多更高更具体的向西方学习的建议。作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6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61页。

业的中国留学生，他赴美时刚刚二十岁，如果说后来那些比他出国时年岁大得多的留学欧美的学者，更多是从学术和技术的角度学习西方先进之处的话，那么容闳就更多更容易地接受美式思想和西方价值观，而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或技术层面。也就是说，容闳是第一个全盘西化了的中国人。除了大学里开设的各门课程，容闳还在美国的 2000 多个日子里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以及作为公民的为众生谋福祉的社会责任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多次拒绝了学校给贫困学生提供的资助金，因为领取资助金的前提是要承诺成为传教士，容闳认为这样的承诺会对他理想的实现造成损害。

从他后来归国后的所思所行，可以看出容闳改造中国的思想是一种全面而立体的社会改革理念：既重视人才教育，也重视制度建设，既致力于包括船舰、机械等器物的引进，又致力于铁路、银行等实业的兴办。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在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举措，自然是派遣学子出洋留学——选派幼童出洋肄业，“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因此，容闳常常被视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推进的第一人，亦被视为中国近代化（即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而走向现代化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容闳的永恒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现代化思想品格具有超人一筹的高度。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大体沿着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面展开。一般而言，学习西方的思潮有赖于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行呐喊，继之由洋务派承其后续，付诸实践。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在变局危机和忧患意识下，虽然各自对中学和西学的含义和内容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以传统的认知心理去附会西学，以道器体用关系审视和汲取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主张，成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支配了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改革的基调和方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又成了处在传统社会里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后不可跨越的思想障碍。与其他同时代人不同的是，容闳青少年时代特殊的成长道路，使他亲尝了西方文明的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着更深层更真切的理解，因此较早地产生了以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特征实行社会改革的维新思想。他的代表作《西学东渐记》中，所表述的“西学东渐”要旨，没有具体的理论阐发，

失之笼统，但结合他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可见，容闳心目中的西学，是一整套以美国为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是对封建的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改造。他的思想经历决定了他能够突破长期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中的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困扰，能够突破“中体西用”的理论局限。

二 官派留美

19世纪60年代，经容闳的不断努力，加之洋务派基于对洋务人才的迫切需求，清王朝终于有了派遣学子出洋学习的行动。其时洋务派重要人物曾国藩等领衔奏请清政府批准，得到为了加强对中国施加文化影响和商业渗透的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美国的计划得以实施。尽管由于诸多时代原因，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但这种旷古未有的教育举措，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乃至社会转型，进而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幼童留美计划之缘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西方殖民侵略势力的战争中屡遭败北、“创巨痛深”，朝野上下纷纷主张变法图强、培育人才。国人有感于中西方文化形势的逆转，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时代，采习西学。处于内外交困的封建王朝出于救急应变寻求西器西艺的目的，在一些洋务官僚的再三奏请下，允准派遣学子出国深造，希望他们“在出国之后，能够尽量观察别国富强康乐的原因所在，学习它的优良学术和技能，以期在将来回国服务时，能斟酌自己国家的民情、风俗、环境，提出最妥善的改进办法，使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与人并驾齐驱，以增进国家民族之幸福”^①。

幼童留美是晚清首次官派留学，作为洋务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洋务运动培养所需人才。奕訢等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深谙人才匮乏之弊，而人才的培养依靠近代新式的教育机构，为此自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

^① 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册“前言”，（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第7~8页。

批洋务学堂。这些学堂的创办促进了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培养了一些初步了解西方学术的专业人才。然而，“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洋务派官僚逐渐意识到，只有直接派员前往西方，才能真正学到自己所要的西学内容，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的主张。最早提出派遣学子出洋留学的想法，是王朝的一位官卑职低的小官吏——拣选知县桂文灿。1863年，他在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呈递的条陈中说：“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引之。”对此奕訢深表赞同：“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①随后薛福成亦提出：“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②由此可见，对洋务人才的渴求足遣童留美的主要动因。

洋务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风气日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具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但与具体留学计划的出台尚有不小的距离。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留学生——容闳个人的努力，直接催生了幼童留美计划的实现。虽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浸染，其时就怀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理想目标，毅然回到祖国后，意欲通过自身说法促使清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让他付出了20多年的曲折努力。

1854年回国后，容闳以其没有丝毫政治地位的一介平民身份，为了实现自己的留学计划，用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担任过西人书记、海关翻译，还从事过丝茶贸易。在求职谋生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寻求实现自己留学计划的机会，但多年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863年，经朋友介绍，他得以与洋务派重臣曾国藩初识，并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此后容闳有了结交一些清廷要员的机会，心中搁置了十年的计划也有了借以实现的可能。

根据资料所记，在后来的又一个近十年的时间内，直接促成容闳留学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5卷，故宫博物院抄本影印（1930年刊），第32页。

^②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3页。

计划实行的关键步骤，主要有下述事件。

第一是托丁日昌转呈条陈四则。1868年，容闳托丁日昌上转呈给清廷四则条陈，其中第二条即为派遣学子出洋留学：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①。

条陈写好后，由丁日昌送呈军机大臣文祥转奏。不料，文祥丁忧回籍，条陈石沉大海。

第二是参与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春，天津民众迫于对洋教的仇视而杀害法国天主教徒，并焚毁教堂和医院，酿成“天津教案”。曾国藩、丁日昌受命处理此事，急调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于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处理基本结束时，容闳再次向丁日昌详述了自己的计划，要求他向曾国藩进言自己的留学主张。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国藩大力推荐容闳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曾的首肯，表示愿向朝廷奏请。

第三是曾国藩、李鸿章于1871年9月3日（清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联名呈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附章程）。此折力陈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理由，指出这种举措的重要意义：“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年余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② 同时在所附章程中提出，一方面商知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每年选送留美幼童名额、条件及相关款用，另一方面中国自己在“上海设局”加强对幼童的挑选与培训工作。

第四是曾国藩、李鸿章接着于1872年2月2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22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3～157页。

十九日)再次联呈《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进一步明确幼童留学的规章，并确定了有关负责人：

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銜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揣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益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又运同銜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①居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谙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查有盐运使銜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业经檄令总理沪局^②事宜^③。

至此，派遣幼童留美计划成定案，近代官费留学运动拉开帷幕。

容闳的留学计划能够得到洋务重臣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清政府的旨准，实乃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自鸦片战争尤其太平天国事件以降，清政府和外国的交往日渐增多，亟须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并了解国际事务的外交人才，又因为引进了洋枪洋炮，设立了兵工厂，以及驾船舰、办工厂、开矿山等，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人才，然而国内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派遣留学生出国，成为解决洋务人才匮乏的必要途径。其次，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政府几次派遣官员出外游历，1866年，斌椿带领其子和同文馆学生，由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做向导，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1868年，志刚（总理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孙家谷（总理衙门章京、礼部郎中）等在美国人蒲安臣的协助下，出访美、英、法、普、俄等国。官员游历使朝野上下“于海外情形已窥其要领”，闭目塞听的情况有所改观。再次是西方国家如英、美诸国欲借招收中国学子留学以拉拢清政府。如在1868年，志刚、孙

① 指美国。——引者注

② 指在上海成立的选拔训练幼童的机构——出洋肄业局。——引者注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7~159页。



家谷等出使美国所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①这就为中国留学生的派遣提供了条约依据。又如1871年春,李鸿章与英国公使谈及派赴留美生时,英国公使“意颇欣许”,加之官派留学的倡导者容闳本身是留美生,“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且中美两国虽然相隔遥远,但“由太平洋乘轮船径达美国,月余可至,尚非甚难之事”^②。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中国首批赴美官派留学,掀开了中国留学教育最重要的一页。

(二) 留美幼童的选拔与派遣

幼童留学的具体计划一经确定之后,容闳即着手筹备招生。挑选学生出洋肄业,在中国为首创之举,显然挑选什么样的人出国留学是至为关键的问题。

早在1871年9月3日(清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他们上奏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中即指出,选派学生赴泰西肄业,“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何谓选才难?他们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③这里,已为挑选什么样的人出国留学定下了基调。即是说,被挑选出洋肄业者应具备的素质为聪颖、志趣远大、品质朴实、没有家累。在折中,他们还定下了具体的招生办法:“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札飭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靡费。”^④

①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87页。

②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91~92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3~157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3~157页。

这个招生章程和后来实际的招生办法略有差异，主要是年龄上的规定存在出入。其实正式招生时，年龄改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容闳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招生办法：“照予前次所拟，暂定为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年龄，定在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① 具体的操作程序是：“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② 即先在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即前文提及的“出洋肄业局”），逐年招考学生入校，预备期满，陆续派送。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闭塞，民智未开，舆论对出洋留学颇抱怀疑态度，民众受中国传统乡土观念影响，也不愿子弟背井离乡，远赴外邦求学，因此预备学校初次招考未满足定额。容闳亲赴香港，到英政府所设学校中挑选少年，以补足其数。学生选定后，由学生父兄在“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的志愿书上签名画押。詹天佑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一书中记录了詹天佑父亲所立“具结”的样式和内容^③：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曾祖文贤 祖世贤 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 亲笔画押

关于幼童留美时的自然情况，可从他们注册时留下的个人资料，比如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27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7~159页。

③ 王秋霞编著《詹天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第6~7页。



姓名、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一窥究竟^①。

第一，年龄。在120名幼童中，除了第二批幼童容尚勤、曾溥二人年龄不详外，其余118人赴美时的年龄为：10岁者7人，11岁者19人，12岁者26人，13岁者35人，14岁者26人，15岁者4人，16岁者1人。可见年龄幼小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官方对此有特殊的考虑：幼童“在洋肄业以十五年为率”，“所选学生以十二岁计算，至十五年艺成后回至中国时已二十七八岁，若以二十岁计算，则肄业十五年回至中国将及三十六七岁，其家中父母难保必无事故。且年近二十，再行出洋肄业，未免时过后学，难望有成”^②。但是年龄小，势必使学生的学习基础薄弱，从而影响学习成效，更重要的是，在此年幼时，幼童尚未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随着在美岁月的增多，其言行举止，受美人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对中学的兴趣日渐减少，甚至到达“厌弃儒学”的地步，为后来的文化冲突、计划夭折埋下了伏笔。

第二，籍贯。120名幼童以广东籍为最——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籍8人，安徽籍4人，福建籍2人，山东籍1人。留美幼童多来自广东，是颇引人注意的现象。究其原因，可略归为四点：（1）广东地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地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较早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思想学说的浸染，在观念上比较容易接受出国留学和向西方学习。（2）按照考选计划，具备一定的英文基础是派赴美国的必要条件，广东地区多有青年曾在教会学校接受过英语训练。（3）因无报纸传播消息，北方人多不知此事，而处于近代风气先开之地的广东自然易得风闻，由是导致应考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4）容闳的示范作用。容闳自己是广东香山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子，幼童籍贯集中于粤，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显然与容闳的个人努力和示范作用有很大关系。

第三，出身。留美幼童出身传统士大夫家庭者几近于零，大部分是“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者，少数是为“衣食而来”的贫穷子弟，这也是近代早期留学教育的特点之一。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虽然逐渐增多，

① 参考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新亚学报》1956年第1卷第2期；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李喜所译，《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②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97~98页。

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注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四书五经、科举应试，对西学、西艺则不屑一顾，因此极少有大家子弟远适外国。平民、部分买办及经常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人家庭是大部分幼童的出身背景。如第一批幼童邝荣光，其父在澳洲金矿任矿工，1871年获悉招考幼童出洋，便欣然送子应考。第二批幼童李恩富，其表兄在上海经营茶业，返家将幼童留美计划说得天花乱坠，并且说幼童以后前程似锦，这才说服了李恩富的母亲同意儿子报名；第二批幼童唐国安，其族叔唐廷枢是洋务要员，曾在香港和容闳同学。第三批幼童祁祖彝，其父祁兆熙，从事洋务，曾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

第四，学业根基。在120名出洋留学应选幼童中，有一部分人从小就中西文兼学，如第一批在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中所招的学生。另外，在以后所招三批学生中，仍有一些中西文兼学的学生，其中第三批幼童唐绍仪赴美前，则求学于香港皇仁书院（其前身为中央书院）。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大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学童，自小仍是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具备一定的汉文基础。如第一批从香港招来的詹天佑，1860年出生，七八岁入私塾，1871年（即十一岁时）读完私塾，适逢清政府招收幼童出洋肄业。第二批幼童苏锐钊，广东南海人，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在五岁到十六岁前是接受中国式教育，十六岁那年去上海进入幼童出洋肄业局学习，同年被选入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还有第三批幼童容耀垣自幼熟读中国书，因读书聪慧，以九岁幼龄入选赴美留学。因为这些孩子在洋务派看来肩负着大清国的未来，所以按要求在出国前需要上海预备学校接受严格而正规的训练。他们在预备学校，读书时间多而游戏时间少，且学校的监督非常严格，强迫这些孩子读写中文，稍不如意，就会遭到竹板的惩罚。但多少年以后，这些孩子仍然非常怀念那位暴君式教师，因为在美国留学几年后，他们的中文水平没有落后，反较在国内有了一定的进步，这大大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

1872年8月11日，经过容闳的用心挑选和精心准备，第一批幼童30人在陈兰彬的率领下起程赴美，陪同前往者还有中文教员叶绪东和容元甫，以及翻译曾兰生。而容闳本人则先此一月赴美，接洽学生膳宿和入学事宜。

1873年5月18日，第二批学生出国，由黄胜率领前往。

1874年8月9日,第三批学生出国,由祁兆熙率领前往。

1875年9月16日,第四批学生出国,由邝其昭率领前往。

到1875年,先后四批120名学生全部抵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费留学,容闳努力了近20年的愿望终得实现。正如其所言:“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①就促成幼童留美本身而言,容闳的开山导路之功毋庸置疑。

(三) “享受”美利坚

这些年少的留学者,带着激动而恐惧的心情,告别家人,离开祖国。其时他们的心境正如一个学生所述:“在一种复杂茫然的心情下……与岸上挥泪的亲人及微笑的亲友告别。”^②那么他们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过到底如何呢?对此,历史并没有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故而后人也就难以知晓全貌,现根据目所能及的零星史料掇其片羽,以示大概。

一是《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

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艺,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③。

二是《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

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有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④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26页。

②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见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17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3~157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3~157页。

三是《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

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①。

上列史料透露了清政府对首次派遣的留学生如何管理，曾有过周密的考虑。在幼童赴美时，清政府还在美国设有“幼童出洋肄业局”。该局除负责幼童的各种费用开支、安排汉文教习外，主要监督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委员有随时撤回、募补幼童的权力。在学业上，因朝中大臣都没有在国外留学的经验，只能从原则上规定“肄习西学，兼讲中学”，特别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和四书五经的学习。出洋肄业局也非常注重从道德上管教幼童。与之相应，留美幼童所在的美国康州教育局也是管理留美幼童的具体机构，负责安排幼童的寄宿、入学以及指导美国教师如何教养中国幼童等。现撷取1872年10月9日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Northrop）发表的“致中国幼童教师函”以见其端。此函要求美国教师注意的事项甚多，其主要内容有：

其一、凡中国学生读背书，及散息安歇，须有一定时刻，现视华生虽皆性聪品正，然在幼稚之年，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在该生等，虽言听句从，尤须自行勉励，厥有恒心，庶望为异日之能才。总之中国之人，勉除犹豫，振换惰懒，崇尚俭勤，各华生如亦能仿效行之，将来不失为中国好男子也！

其二、华生将来学成回国，各受执掌，其于中国文字，尤须兼习勿弃。应于每日间酌留四刻，以便专心温习汉书。先期汉教习预定三月功课，届时统由汉教习查封（对），庶中国文字，亦日有进益，腹笥必能阔广。

其三、华生先须勉学忠孝，及爱戴国家，凡所肄我国之才艺，均须克尽心力，猛著祖鞭，勿遗人后。庶中国之人，感受厥益，如能循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7～159页。

循善诱，俾其念兹在兹，庶将来实效可收。

其四、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若当出汗之后，曾须加意谨慎，俾保无虞^①。

作为副监督的容闳在美国留学多年，熟悉美国风土人情，在幼童的教育和生活安排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他经过与耶鲁大学校长鲍脱尔商量，将学生按三两人一组分住在美国家庭里，以期他们从一开始就能过美国环境的生活。美国自1771年独立后，其教育制度开始实施普及的或单轨的教育。教育行政权力操于各州，联邦政府依法不得干预各州教育设施。根据美国人大多以乡村为中心且居住分散的特点，建立一种以社区为范围的学区制，全美五十州，计有十万个学区。中国幼童先后四批抵美后，便被妥善地安置在新英格兰地区教育最发达的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两州邻近哈特福德（Hartford）地区的美国家庭。这些美国家庭承担起监护和教育的双重责任。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在老师家内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准备。美国老师及监护人“家长式的爱护”，显然对初到美国的幼童帮助极大。据梁敦彦回忆，他抵美后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德美人巴特力（D. Badlett）君家居住。巴氏是耶稣教士、哈特福德学校（Hadford DeafDMmb Asylum）教师，有一妻三女一子，家境不算丰盈，但能自足，全家和美安然。巴夫人学问精通，视梁敦彦为己出，照顾颇周到。梁敦彦夜间温习功课，遇有疑问之处，必请教于巴夫人，夫人无不一一详为指教，且选英文中高尚小说嘱咐梁敦彦用心浏览，文字之外，于书中高尚人物品行，尽力进学劝勉。初抵美时，同学中能操英语者仅梁敦彦一人，后又跟从巴氏长女玛丽（Mary BaNett）学习英语，半年后他的英语就讲得和那些美国人一样了^②。

按照留学计划，幼童们先学习英语，等才智逐步增长以后，再攻读各种专门课程，诸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经济、国际法等一切实用学科。经过短暂的磨合，幼童们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他们“聪明而有趣，在游戏场上经常是获胜的；英语学的很好……上公立学校以后，

① [美] B. G. Norththrop（诺索布）：《致中国幼童教师函》，见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珠海出版社，2006，第31页。

② 裴燕生：《从〈顺德梁崧生尚书生平事迹草稿〉（手抄本）看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早年事迹》，《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1期。

与同学相处得很好，由于学业的进步，使老师感到无上的愉快”^①。

在哈特福德读完了小学、中学，有28名幼童考入了著名的哈特福德公立中学（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就读。哈特福德公立中学是一所声名卓著的高中，创建于1683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以教学管理严格著称，毋庸置疑，幼童们在这里获得了学业上的严格训练。在毕业当年梁敦彦还被选为杰出学生代表，参加毕业班讲演比赛。他的讲演题目是《北极熊》，围绕俄土战争揭露沙俄的强盗行径，听众深受感动，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除了学业上的进步，幼童们在哈特福德的课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当时的哈特福德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众多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集中在那里。美国的大文豪马克·吐温就是幼童们的邻居，据说，当年的幼童经常和马克·吐温的女儿跳舞。

1939年耶鲁大学教授菲尔浦斯（W. L. Phelps）出版了他的自传，其中有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在书中，他用充满感情的文字叙述了自己与幼童在哈特福德中学的同窗经历以及对中国同学的印象：

这许多孩子们的装饰，除了拖着一根辫子，与我们无异。当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候缠在头上，辫子一散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我们所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但是他们都是排球、足球、冰上的曲棍球戏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到达巅峰。当脚踏车问世时，学校里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孩子就是张，现在我能眼看着他们骑着这奇怪的机械上街了。

这许多孩子们，不仅在运动方面比我们美国人卓越，在其他方面也要比我们强。由于这种原因，往往引起我们内心的激愤，当他们参加任何社交场所，我们许多美国人即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于女孩子那么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女孩子们老是喜欢与东方人士跳舞，是否他们的风度与谈吐具有正直的魔力，我不敢确定，不过，任何舞会或招待会上，最美丽与动人的女孩子们，终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这是事实。当他们从我们的面前通过，或者接受中国学生们注意的那种温柔，以及使美国孩子感到痛苦的那种表情，使

^① 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第32页。

我永远不能忘怀。以我个人来说,对这种场合,反感到兴趣,因为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学跳舞,而这种民族的竞争,引起我戏剧性的直觉,认为东方人的跳舞很优美^①。

尽管作为中国第一批官派生,留美幼童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欢迎,受到了许许多多善良的美国人的关心和爱护,在学业和生活上幼童似乎也处在游刃有余的状态,但是中美两国的现实差距太大,中国是贫弱之国,美国是富强之国,留美幼童虽然在美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怀,然而大批做苦力的华工在美国却备受歧视和欺辱。在美国舒适的环境里,幼童们仍然不可避免地有着边缘人的体验。如詹天佑在美国留学期间,深深体会到祖国的贫弱和国际地位的日益低落以及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歧视,因此他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应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所以当他中学毕业后就决意投考工程学系,愿以自己勤苦学习的成绩来为祖国服务。

有多少幼童上过美国的大学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据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至少有50名幼童进了大学,其中22名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幼童就读,包括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宋文翔、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另有3名幼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是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5名幼童进入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其中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令人痛惜的是,他因过度刻苦而在入校一年后病逝。

(四) 争论“留”与“撤”

幼童留美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不得不实行的应时之举,并非一项稳定的国家政策,自计划和行动的那日起,就始终处在朝野守旧势力的包围和攻击下。它的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

^① 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第33页。

章、丁日昌等的支持，但随着 1872 年对幼童留美支持最力的曾国藩的去世、丁日昌的丁忧回籍，“支持派”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适逢美国排华气氛炽烈，清政府守旧势力乘机向主张洋务的李鸿章等展开攻击性的夺权斗争，幼童留学计划也被戴上“西化教育”的帽子而受到攻击。1878 年之后，双方关于留美肄业局撤废的矛盾已经日益明朗。

1878 年，清政府委任顽固守旧的吴子登为留美肄业局新任监督。他被容闳视为“留学界之大敌”，因对遣派留学一事素有成见，加之与容闳在共事时颇有龃龉，对已定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于是向李鸿章不断上书，大肆攻击容闳及在美学童。据容闳所记，吴在上书中攻讦：

谓予^①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②。

关于留美学生荒废中学、生活方式自由散漫等指责言论，早在第一任监督陈兰彬在任时就常有。陈兰彬为“老成端谨，中学较深”的旧学派人物，与副监督容闳在观念、志趣、培养留学生的目标方面均大相径庭。容闳是按照美国教育方式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学生的行为方式，而陈兰彬虽身在美国，但对影响留学生观念变化的美国教育环境漠然无知，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古旧中国人的见解。因此，陈兰彬不会理解和容忍在留学生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这些变化为“流弊”“恶习”或“离经叛道”，反而对接受民主观念的幼童采取愈来愈严厉的管教：“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

① 指容闳。——引者注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 138 页。



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见。”^①继陈兰彬之后，清政府派充留学正监督者先后还有三人：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此三人均为翰林出身，对待幼童的态度与容闳亦颇为相悖。如区谔良上书条陈局中利弊，要求中道撤回留学生；容增祥也向李鸿章告状，认为学生抛弃中国传统，都是由于容闳偏执纵容。尽管几位监督都先后打过指责幼童离经叛道、容闳纵容幼童的小报告，但是由于当时肄业局得到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所以这些报告没有给肄业局带来太大的影响。所谓“三人成虎”，随着时局的变化，李鸿章的态度也逐渐变得不再积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子登在书信中明确提出“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的建议，说明守旧力量有把攻击留美幼童的声浪推向高潮的趋势。

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与在美国的吴子登遥相呼应，以幼童入教为借口向朝廷上奏，主张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留美幼童：

至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该局帮办翻译黄姓，久为教徒，暗诱各生进教，偕入礼拜堂中……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是闽局之废弛如此，洋局之废弛又如彼，该学生等或习为游戏，或流为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请旨飭下南北洋大臣转飭确查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其入教各生，一并撤令回华，免除流弊^②。

朝廷接奏后，当日发出上谕：“著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约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③

清政府考虑裁撤留美肄业局，召回留美幼童的消息传出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一些反响，在容闳的吁请下，杜吉尔牧师起草了一个声明书寄给美国驻华公使，再转呈李鸿章。在声明书中，杜吉尔说明“肄业局成绩卓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02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9页。

③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52页。

著，成功在即，如中途撤回，实属可惜”^①。美国总统格兰特也致函李鸿章，强调指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有成，若裁撤极为可惜。”^②

如果说美国官方的态度尚属温和，那么相较而言，美国教育界的态度则比较激进直接，可谓全力阻止。耶鲁大学校长朴德执笔的签名书，代表了美国多数大教育家和大学校长的意见：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亏乎？……且敝国无端蒙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③。

在朝野以及美国各方的压力面前，李鸿章对肄业局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其意在半撤半留之间：“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之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可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其总办、教习、翻译等员，一概可裁，尚系审时度势之言。莼甫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中，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理喻者。”^④

由于李鸿章的回避态度，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上奏，“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慈禧太后当日即批示同意，下令将幼童悉数撤回，这场关于“留”与“撤”的争论就此画上句号。

①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第275页。

②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1“电报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4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42～144页。

④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155～156页。



清政府的反应是其主观意识的合理发展。在清政府和洋务官僚看来,派幼童到域外学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它的前提是要有完备无缺的定制,有留学监督的严厉管束,有汉文教习教授汉文,这样就能够保证西学、中学齐头并进,又能保证幼童不“囿于西学”,从而达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但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留学行为本身必然会带来异域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交流是相互渗透的,这由文化的排他性和融合性所决定。所以,留学生在异域学习本国文化,只能加强对本土文化的学习,但不能阻止异域文化的影响,更不能在接受一部分异域文化的同时而不受其他部分的影响,清政府企望留美幼童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又不受其社会科学及生活习俗乃至观念信仰的影响,显然行不通。

1881年7月,清政府撤回幼童的谕令传到美国,幼童开始准备撤离。到1881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被分成三批凄然回国。至是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

(五) 留美幼童的“遗留”

按照清政府原计划,留美幼童学成回国后,由政府授以正当的官阶,俸禄地位与经过传统考试及格之官员相类似。但由于新旧纷争而导致被中途撤回的留美幼童,在1881年回国之初即遭到冷遇。这从幼童黄开甲以充满愤懑和苦涩的情绪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可以得见: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桩,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①

^① 黄开甲:《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的信》(1882年1月28日),见高宗鲁搜集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第14~15页。

至于工作分配,据1881年6月8日(清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在撤回留美幼童的奏折中所说:“至诸生肄业既久。于原定章程九门当亦渐通门径,回华后察其造诣浅深,分配各处,庶无失材器使之意。”^①事实上,他们多被送入洋务学堂,改学国内急需的其他专业。有的被送到电报局学传电报,有的被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还有的被分拨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幼童们虽然全都服从分配,但他们对这种职业分配结果大为失望,因为“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而他们的笨拙无知,使他们对这种事根本无法下判断”。以致返国的留美幼童中,“有少数被旧习腐化的倾向,有人已散漫不堪生活颓废,但大多数对恶势力对官僚习气抗拒仍坚定不移”^②。

然而,社会的发展总不以那些严守陈规者的意志为转移,值幼童由美归国之际,历史的车轮已经将中国社会推向现代化的道路。在国外学习了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幼童,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低谷后,最终还是在这个处在伟大变革时代的国家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封建官僚集团的怀疑和压制下,实现着振兴祖国、捍卫民族尊严的人生理想。

从职业的角度对留美幼童进行分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的一生中都从事过多种职业,只有少数幼童可以按其贡献最显著的职业来归类,比如罗国瑞、詹天佑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贡献最大,而将他们划归铁路界。其余幼童广泛分布于洋务事业的各领域,诸如海军、矿冶、电报、兵工厂、造船厂、海关、纺织、招商局、教育、外交等。大致估算,这些幼童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科技早期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甚至重大的贡献。

在外交领域,幼童较之国内士人,不仅受过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而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65~166页。

② 黄开甲:《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的信》(1882年1月28日),见高宗鲁搜集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第19~20页。



且兼通西语，甲午战争后，他们逐渐被清政府起用。据统计，留美幼童中有二十多人担任过出使外交人员。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西洋留学生的地位迅速提高，留美幼童在外交界任要职者逐渐增多。其中如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廷干等都担任过外交部总长，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为中外瞩目的政治外交人物。现择其中较著名的人物梁诚与唐绍仪二氏的事迹以显一斑：1897年，梁诚经钦差大臣头等出使英国大臣张荫桓奏带出洋，派充头等参赞官，差竣回华，同年，以道员发往沿江沿海最繁洋务省份补用，并加二品顶戴。后来梁诚升任中国驻美公使，是清末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在任内直接促成了庚款留美计划，由此建立起清华学堂，培养了大批的近代学人。1905年，唐绍仪以副都统衔兼候补三品京堂，担任出使英国大臣。近代中国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外交情势，没有强大实力作后盾的对外交涉显得尤其艰难，但是外交领域的幼童都能维护民族权益，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比如在中英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唐绍仪被任命为西藏议约全权大臣，他在谈判中采取完全出乎西方列强意料之外的罕见的强硬态度，宁愿中断谈判回国，亦不在没有明确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条约上签押。后来又采取在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的办法，使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后，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中明确指出：“英国国家允不占西藏境及不干涉西藏的一切政治。”^① 尽管条约规定西藏的电线、铁路、矿务等项利权有中英共享之意，但达到了保留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个主要的目的。由于在外交事务上表现优异，故而其时报刊对其大力称誉：“唐氏留学西洋多年，回国后担任领事、海关道等职，学问渊博，阅历亦深，实我国谙练外交之能手也……其通晓中外情形，谙练外交事务，遇事办理交涉，条理明晰，意见透彻，非寻常外交家可比。”^② 当时日本报纸亦曾赞誉唐绍仪为“新进气锐之政治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则称唐绍仪为“外务部中最具才干能力的尚书”^③。

在教育界中，幼童也发挥了学之所长，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尤以唐国安功绩卓著。唐氏曾经担任过“游美学务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345页。

② 《唐侍郎于外部之地位》，1906年7月21日《顺天时报》。

③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48页。

处”会办，参与组织了1910年、1911年两次挑选留学生的考试。这些留学生大都在美学业优异、表现突出，毕业后在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如杰出科学家竺可桢、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大师赵元任，以及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代部长的唐悦良等，无不称自己是唐国安的“弟子”，故后人称唐国安为“容闳第二”。唐氏还担任过首任清华大学校长，上任后即对学校进行全面整肃，整顿校务和教学秩序，制定学制和课程，将原来校址面积从370亩扩展到480亩，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还开设了体育课程，把学制定为八年，分中、高两个阶段，每段四年，在北京和上海设立招生处，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清华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唐国安有奠基之功。幼童中担任过大学校长者还有：蔡绍基于1904年接任北洋大学校长，林联辉出任北洋医学堂第一任校长，周长龄担任过唐山铁路学堂校长。此外，程大器、黄有章、容尚勤等也都担任过教职。他们利用自己早出国门的优势，在教育界破旧立新，在科学教育、家庭教育、新式教法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在海军领域，幼童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之际，正是国内大力筹建海军之时。这些留美生虽非海军专业，但有43名返华幼童被分发到新成立的海军舰队及附属单位服役，几乎占被召归的全体幼童的一半，其中16名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其余二十余人分在天津北洋舰队的各单位。凡参加海军的幼童，都进入海军学校学习，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大沽鱼雷学堂等，进修相应的海军技术。他们在美留学多年，具备一定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经过海军学校专业学习后，很快成为海军技术人才。其中有的担任海军学校教员，如第二批幼童苏锐钊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即被任命为黄埔水陆师学堂教官，第一批幼童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即留校教授英文和驾驶等课程，后又调往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有的幼童毕业后直接登上军舰，成为真正的海军。这些人大多参加了中法海战或中日甲午海战，他们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挺身抗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在参加中法海战的六名幼童中，有四名壮烈牺牲。而参加中日甲午海战的十一名幼童，分布在各军舰上，无不英勇抗敌。例如，身为济远舰大副的第四批留美幼童沈寿昌镇定自若，坚守岗位，被炮弹击中，头裂而死；任定远舰枪炮官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徐振鹏英勇却敌，发炮命中日舰西京丸左右舷侧及上甲板，使该舰舵机失灵，逃离战场。甲午战争后，不少留学生离开海军转向他业，而那些留职者仍能洁



身自爱、尽忠职守。进入民国后，尚有近十人任职海军，且大多成为舰长、舰队司令乃至海军次长。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幼童在美国虽然所学时间长短不一，但是他们都学到了体系较为完整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这样的学识让他们回到国内后，能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如众所周知的詹天佑，他主持我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该条铁路的开通意味着中国真正自办铁路的开始。而为铁路事业付出毕生精力的幼童，还有罗国瑞、钟文耀、黄仲良、苏锐钊、邝景扬、梁如浩、沈嘉树、周长龄、杨昌龄等。除了铁路建设，幼童还在邮电、地质等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据统计，有二十余人曾从事过与邮电相关的职业。幼童回国之时，正是国内兴建电报干线的时候，他们大量参与其中。其中的重要人物如周万鹏，该氏曾任全国电政总局局长、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领邮政总局及电政督办，对邮电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他还有朱宝奎、唐元湛、袁长坤、陶廷赓等，不仅对邮电业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而且还以自己的事业建树捍卫了国家邮电业主权。

在地质学领域，幼童曾从事过地质矿冶工作者约有十五人，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中国第一代地质工程师，其中尤以吴仰曾、邝炳光和邝荣光最为著名。吴仰曾从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幸运地被李鸿章再次派遣赴英国留学。学成归国后，他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矿产开发中，同时还在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中担任勘察工作。邝荣光是另一位幼童地质工程师的代表，他被美国矿师会、机器师会和化学会公举为国际矿务新法议员，是近代中国早期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少数人之一。他绘制的《直隶地质图》是中国人独立绘制的第一幅地质图，《直隶石层古迹》是中国人第一幅古生物图版，开创了国人古生物学研究的先河^①，由此也开创了中国独立从事应用地质学研究的先河。

尽管留美幼童计划最终夭折，但是幼童回国后，或参与了政治外交活动，或参加了卫国军事战争，或进入各个新兴事业领域工作，他们都给中国学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在教育方面带回了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在自然科学方面带回了新的技术、更完整的体系，在政治方面使得中

^① 茆诗珍、徐飞：《留美幼童与中国早期地质学——近代中国发表的首套地质矿产图》，《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22卷第6期。

国的外交与世界接轨同步等。总之，他们留给了后人丰富的遗产，表明幼童留美计划还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六) 从留学到“流学”

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他们全部被清政府强行召回。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留学计划中途流产的直接原因自然是顽固势力的剿杀，其实质则是西方近代学术同中国传统经义的冲突。

洋务教育的口号是“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幼童留美行动自然也是以此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在留学方案拟订的时候就明确规定，肄习西学还要兼讲中学，课以小学、五经、《孝经》及《国朝律例》等书。主持其事者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能粗通西方科技皮毛的“卑恭之大清顺民”，借以挽救其时垂危的封建统治。为了防范幼童成为“美化”之人，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幼童出洋后，正副二委员定期召集孩子们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以免他们被异学腐蚀，这与容闳的初衷存在很大差异。容闳是一位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新型知识分子，当初他主张派遣幼童留美的目的，在于期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使留学生接受彻底的西方文化教育，回国后才不致拘泥于中国的传统积习，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①。双方出发点的不同，自然使留美计划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冲突的火种。

正是因为容闳与洋务派的这种貌合神离，冲突乃至最后分裂就不可避免。容闳赴美前夕，其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对其推心置腹，认为容闳所主张的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对立，政府又守旧，因此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量，或者事败于垂成。不幸此言成谶，幼童到达美国后，如同容闳所设想的那样，迅速西化，厌恶烦琐的封建礼节和枯燥的封建教条，不愿下跪叩头，不愿诵经行礼，言论思想悉与封建旧教育背道而驰。如此“美化”，无论在清政府的顽固派眼中，还是洋务派眼中，都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所有这些都价值他们的价值观判定为“适异忘本”、“离经叛道”的行为，剪辫子意味着对朝廷的不忠，加入异教更意味着对朝廷和祖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124页。

宗的背叛，因此才招致顽固派上书力言裁撤、洋务派左右摇摆难定、清朝廷颀预中途回车。

从留学方案本身看，幼童留美也有很多不妥之处，比如规定应选者为“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资性聪慧，并稍通中国文理者”。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士子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对西学内容毫无基础，而年龄稍大的要从头学习外语和数理比较困难。但是，选派没有中西学教育根基的幼童出国进行长达十五年的学习，且不说幼童心思易动容易丢弃“中学”之本，单单是巨额留学经费的消耗就决定了这一计划的不可持续性。区区120名留学生要经过近二十年的培养才能为我所用，在当时千疮百孔、需才孔亟的中国，这个方案实在算不上考虑周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81年作出“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议，使这个本不十分完美的留学计划毁于一旦，幼童被召回时，其中只有两人从大学毕业，多数刚刚进入大学，所学未成，“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而中途夭折，以致留学成了“留学”。这既是留学教育史上一大损失，也是晚清留学政策的最大失误。爱国诗人黄遵宪曾为此作长诗一首，以表达其极为悲愤之情：“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去。万感心伤悲。”^①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指出：“全部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②二十年后，梁启超做新大陆之游时，至哈佛，谈起幼童当年被迫返国一事仍扼腕痛惜，“为歔歔久之”^③。

幼童留学失败后，中国人赴美留学运动骤然沉寂，直到清末“新政”发起尤其最后数年间美国退回部分庚款后，中国才重启官派留美之途。当然也是因为此次失败的教训，以后清政府派遣船政学生留欧，对留学生的年龄、外语要求、学识基础以及留学年限等问题，都作了重大改进，使船

① 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见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09～114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1卷“考试”（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第41页。

③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0辑，岳麓书社，1985，第470～472页。

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这也算是幼童留美对中国留学教育的独特贡献吧。

三 欧陆求“技”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开明封建官吏组织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改革运动。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洋务派开创的留学教育事业也与强军御侮相联系。以军事留德发其端，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续其后，留欧教育开创了海军为主兼及陆军的派遣格局。从此，清政府走上了高级军事技术人才“寓教于外”的道路。

(一) 洋务教育的兴起

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为起点的洋务教育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是第一个洋务教育机构。

1861年，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败局，恭亲王奕訢等“揆时度势”，向清政府递上应对时局的奏折，其中首次提到设立同文馆一事：“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飭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① 1862年7月11日（清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同文馆正式成立，招收十名学生在馆学习，聘请英国包尔腾及汉人徐澍琳分任中外教习。1863年春，同文馆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后来在1871年开设了德文馆，1897年又设东文馆。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同文馆的教育内容还突破了语言文字的界限，添设了天文算学、万国公法等内容。

同文馆的设立，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已经成为识时务的洋务派官员的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华民族从中世纪迈向近代这种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的一块思想界碑，但是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价值，并不是很快就被人们认识、理解和接纳。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到在教育实践中落实，其间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

“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为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提出。这一口号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页。